

西方文学中“人”的母题流变

——从生命权力出发

贾宇豪¹ 陈聪^{2*}

1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辽宁沈阳 110000

2 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 辽宁沈阳 110000

摘 要:“文学即人学”。对人的自我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探究构成了西方文化演变的根本驱动力。在这样的文化背景滋养下,西方文学沉淀着深厚的人伦感悟和人性深度,历经数千年,将主体返复与生命之重娓娓道来。生命权力论发端于福柯,并在阿甘本手中得以大成,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特质与更加丰富的内涵。将目光投向绵延的时间线中,“人”的母题之流变随时代轮转意义表征不尽相同,但西方文学紧叩着生命权力的草蛇灰线,始终如一。从福柯眼中履行“生命管理职能”的有效客体,再到阿甘本对例外状态的格外关注,生命权力的何去何从无疑为西方文学“人”的母题脉络梳理提供了新的线索。西方文学中人主体的高昂直至个体的湮灭,其走过的漫漫长路,我们必须厘清。

关键词: 生命权利; 生命政治; 母题

1. 引言

植根于西方文学对人的多维度探索,高尔基提出了“文学即人学”这一命题。西方文学以人为核心揭示人性各面,从而蕴积了深厚的人学母题。由于西方文化的人本传统,也直接导向了西方学界对人的研究本身成为一种学问(人学),对文学的研究也始终紧绕人为中心,对文学中的世间百态,人性繁复展开全面深入挖掘。而现如今对于“人”的母题的深度把握早已超出文学的范畴,上升到了“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高度。“生命权力”的提法肇始于福柯,但其作为人的本质性思考,正如阿甘本所见,在遥远的古希腊时代早已有之。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内涵之丰富早已超出政治哲学的边界,与文学紧密结合。

2. “主体性的艰难建构”——从古希腊到 18 世纪

从古希腊伊始,西方文学一路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建构与生命权力一路高扬的过程。人与自然的分离宣告着生命权力对自身的回归。古希腊—罗马神话作为人类童年时期的象征性表述,其承载着原始先民对于生命本源的思考与自由意志的展望。再经由漫长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自我回归与人本意识的思考在时代发展的阵痛中不断弥合。直至 17、18 世纪——那理性高扬,生命权力复归的时代。

17 世纪的欧洲奉理性与秩序为圭臬,此种时代精神的盛行也为其他诸多领域奠定了思想内核——西方文学中“人”的母题也随之演变。16 世纪至 17 世纪中叶,西欧战乱频仍,冲突频发,秩序与理性在此境遇下便成为人们眼中的救世良药。在此基础上,“我思故我在”的哲思横空出世,人的思维意识与理性被本体化具象化,人的主体性在笛卡尔手中被推向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古典主义文学便乘着理性的东风,将其作为自己的生命,直面人对生命权力的掌控。人的主体意识高扬,生命权力实现了从上帝到人的复归。

朱学勤指出:18 世纪理性兴盛的时代。无论是培根到洛克的英国经验理性,还是从帕斯卡到笛卡尔的法国先验理性,两种“理性的声音”交汇成了启蒙时代的最强音。卢梭在《忏悔录》与《新爱洛丽丝》中,宗教与传统道德的伪善庇护被人们彻底抛开,对健康的自然人性发出热烈的召唤;在歌德笔下,浮士德在人的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的永恒矛盾之下艰难的咀嚼着生命自由与困惑的苦果,将“人”的母题之探索推向了更广袤的天地。

3. 现代西方文学中的“生命权力”走向——从福柯到阿甘本

在福柯眼中,“生命权力”作为对个体生命全程监控

与干预的权力架构，其主要涵盖了两个主要维度：一，便所谓的“身体的解剖政治学”，人的肉体在此沦为权力机制与规训法则下的基本单位；二，即“人口的生物政治”，意即对作为生命载体的肉体进行全方位持续不断的介入与控制。生命权力不再像以往的方式那样“让你死”，而是通过“安全技术”——一种超越传统的生杀予夺的现代化模式，赋予你“活”的合法权力。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作为生物学上的人与作为个体意义上的人，其实早就被悬置起来，被置于某种有效且隐匿的权力装置的监管之下，并且以其为限度。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治理术”。这种权力兼具肯定性与否定性的力量，规范化的与标准化的“生命监督与管理”成为其主要行使职能。在此，人的存在被纳入了政治之域，人的主体性被剥夺殆尽，沦为数量庞大的、顺从的、高效的、训练有素的“驯服的身体”。而“生命权力”已在政治的悄然介入下发生了根本性的置换，“生命政治”便袍笏登场，成为现代人被阉割后的典型形式。

不同于福柯把生命政治看作现代性的产物，在阿甘本对于人类共同体的“原始结构”关注来看，生命政治本来就与人类相伴而生。在《神圣人》一著开篇处阿甘本就指出，今天英文中的“life”一词，在古希腊可以找到两处对应：“zoē”（近汉语“生命”义）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世间诸物）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生物学意义上的“存活”；“bios”（近汉语“生活”义）则意指个体或群体适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活着”，而且是活得有质量、活得幸福、活得有意义^[1]。对于文学而言，后者正是其一直所表现所追问的终极问题。而对于阿甘本而言，现代生活的症结所在，便是那个被排除的基本元素——自然生命，其通过被排除的方式而被纳入到政治之域。因此，在生命政治的视域下，现代性和古典性确有迹可循，只是现代性状况下它发展出了一个极端的新状态。

20 世纪，在非理性主义文化土壤滋养下的西方文学，结出了别样的硕果。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理性”以一别于往的形象闯入人们视野，那些荒诞的与人作对的神秘力量纷纷被纳入理性之域。在此，“理性”冥冥之中与生命权力在某种程度上画上了等号。福柯的分析已告诉我们：人的自然生命成为了权力作用的对象，从出生、死亡、生育到疾病等各个方面，都被现代政治的全方位“治理”所涵盖。在这个层面，生命是通过被客体化的途径被整合

进政治体系之中的。而阿甘本的分析，则更进一步。从古典视角来看，生活本来就是政治性的；而所谓“生命政治”，便正是将自然生命也拉到政治里来——在现代世界里生命则被捕获、被征用、被控制。现代政治下，生命权力被剥夺后人的悲惨处境便在作品中以不同表征出现：卡夫卡小说中将人排除在城堡外的神秘力量；“二十二条军规”下掺杂着血与泪的冰冷幽默；萨特笔下无法逃避的“恶心”存在，都是主人公对主体湮灭后自我无根性的无所适从与无可奈何。人作为生命政治的产物，作为“被驯服的主体”，在对生命权力何去何从的迷惘中跌跌撞撞，在这不可见的异己力量中举步维艰。这便是 20 世纪西方文学中畸形环伺，病态遍布，冲动与死亡频仍，梦境与独白交织的原因所在。

3.1 《死屋手记》——“赤裸生命”的诞生

陀氏的诸多作品对于生命权力可提供极好的诠释路径。阿甘本认为赤裸生命是由法律的悬置和宗教的驱逐所造成的例外状态结果，赤裸生命处在一个空白的无区分地带。在这种悬法的例外状态中，赤裸生命失去了对生命权力的掌控，同时也暴露在不可挽回的“弃置”面前，遭受了法律和宗教弃置的赤裸生命，便是“不能被祭祀却可以被杀死的生命”^[1]。被剥夺了国籍与法律庇护的赤裸生命，被置身于模糊的法律边缘地带，其境遇无异于失去人权保护的牲畜，任由主权者肆意处置。至高权力者（主权者）是法律秩序的奠定者。但其至高权力“完全不受法律约束，同时自身又是法律正当性的来源”^[2]。主权者游移于法律的边界中，在“至高决断”中将规范奠定，又随时在“例外状态”中将其抛诸脑后。主权者以“安全”、“正常化”为口号，将差异与个性弥平，整个人类社会被标准化、同一化。其通过决断例外状态，而使得自然生命随时可转变成为赤裸生命。《死屋手记》中主人公政治生命的被剥夺显然浸润着作者被流放经历的深刻痛楚。主权者（沙俄统治者）可通过将其自然生命（主人公奥尔洛夫）排除出现代共同体的方式（流放剥夺政治生命）将其贬黜为“赤裸生命”，身心被肆意践踏。生命权力的所属主体从未是戈梁奇科夫自己。正是在此意义上，“集中营”被阿甘本推向现代共同体形态的典范：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随时可能被终结为赤裸生命。

3.2 《审判》——“极端形式”的典范性意义

关于生命政治与权力的走向，阿甘本随与福柯一脉相

承,但与其有着深层次的分别甚至抵牾:阿氏聚焦于“例外状态”(即极端状态与非正常状态)。他认为,诸如公民社会、人权状态等“正常状态,并不足以揭示政治领域的本质,而“例外状态”才映射出了政治之域的真实状况,因此具有典范意义。尽管现实中并非每个人都会真的失去庇护,完全暴露,但每个人头顶上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可能刺下,将自己转变成赤裸生命,所以在这样的例外状态下挣扎着的赤裸生命才真正具有典范性。在卡夫卡经典作品《审判》中,这种“极端状态”的存在更为明显。主人公约瑟夫·K在一天被告知有罪,但并未对其进行审判裁决。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作着徒劳的努力,惶惶不可终日,最终在一天被两人拖出去用屠刀戮死。约瑟夫·K生命的终结并非简单自然生命的消亡,其文本隐喻着现代人的生存状态——那惶惶不可终日的,可随时到来的“例外状态”,尽管我们大多数人未曾意识到。从作品中我们不难窥见,卡夫卡用一个荒诞的故事向我们宣告着生命的苍凉——赤裸生命披着权利的“神圣外衣”、作为“自由的承载者”,但我们不能忘记它时时刻刻是权力与法律的操控对象。从文本中我们也可以窥得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现实:约瑟夫·K在被宣告有罪后的一切努力,实际上是“以个体之名在他们与中央权力的冲突中赢得诸种空间与自由,但这样只会愈加把自己的个体生命刻写进国家秩序中,从而为那个他本想使自己从其手中解放出来的至高权力提供了一个新的且更加牢固的基础”^[1]。

4. “对抗神圣化”——通向幸福生活的路径

从上述的文本与理论分析我们不禁追问,是否现代人只能站在生命权力被解构的断壁残垣中无可奈何?对西方文学中对生命权力的探寻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阿甘本延续着斯宾诺莎——德勒兹这条主线为我们揭示着通向幸福彼岸的路径。斯宾诺莎认为,某种程度上生命形式就代表着生命本身,在此意义上,生命之本质直指生命形态的塑造与坚持;而德勒兹则从生命潜在性的本体论视角出发对其进行了探讨:诸种“生活形式”乃是实在性,而“生

命之形式”则是纯粹的潜在性。从这样的视角出发,生命本身的权力并不在于它可以变成什么(某一种生活形式),而是它成为了彻彻底底的可供自我选择的否定力量。现代人作为“任意的独体”,没有认同,也没有任何归属性的共同体意识。正如古希腊人通过“关切自身”的伦理行为,不仅打通了美学与生命的连接道路,而且还打破了美学与政治之间的界限。古人的积极模式说明,我们可以通过自愿的行为将自己变成一个独特的生命存在,变成一件个性化的艺术作品^[1]。在此意义上,人作为最绝对意义上的个体,拒绝着“随时到来的共同体”无孔不入的神圣化,抗拒着至高主权装置对于生命的肆意征用。“到城堡去”的执念,我们应该放下。

5. 结语

人生命权力的回归在漫长的西方文学历程中进行着递进式循环,其反复如同钟摆,来了又去从未停止。西方文学史见证着“人”对生命思考之阵痛。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应厘清“人”的母题在西方文学中的流变,正视文学承载的生命权力之复归与游离,才能站在生命的永恒之轮上,轻盈的起舞。

参考文献:

- [1] 吴冠军.生命权力的两张面孔——透析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论[J].哲学研究,2014,(08):77-85+129.
- [2] 吴诗琪.阿甘本论赤裸生命与例外状态[J].美与时代(下),2021,(07):12-17.
- [3] 吴冠军.生命政治:在福柯与阿甘本之间[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01):93-99.
- [4] Agamben,Homer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p.10.
- [5] 欧阳谦.福柯的新政治观:一种微观权力的谱系学建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26(02):57-64.

通讯作者:陈聪,副教授,文学博士,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西比较文学。